

水木思语

谈清华“会通”学术传统

胡显章

自清华学校国学院始，文化的会通就逐步成为清华的一种文化自觉和办学风格。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复建清华文科时，清华会通型老学长王瑶说：清华文科的传统是“会通”。什么是“会通”？它在中国思想文化和清华发展史中发生过什么作用？怎样理解它的当代内涵和意义？

依据史料，“会通”一词最早可见于《周易·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由于在思维方式上强调整体性、综合性、和谐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会通”成为中国学人长期遵循的观察事理研究学问的方法。正是依据会通的理路实现了中国思想文化上儒释道的融合。东汉思想家、哲学家王充在《论衡·超奇篇》中把儒林人士分为四等：“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

人，采掇传书以上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又说：“通书千篇以上，万卷下，弘畅雅闲，审定文读，而以教授为人师者，通人也。”强调人师至少应为“通人”。宋代鸿儒朱熹对“会通”做了这样的诠释：“会是众理聚处，虽觉得有许多难易窒碍，必于其中，却得个通底道理。谓如庖丁解牛，于族处却批大却，寻大可，此是其筋骨丛聚之所，得其可通之理，故十九年而刀若新发于硎。且如事理间，若不于会处理会，却只见得一偏，便如何行得通。须是于会处都理会，其间却自有是个通处，便如脉理相似，到得多处，自然通贯得，所以可行其典礼。盖会而不通，便窒塞而不可行；通而不会，便不知许多曲直错杂处。”他又说：“举一而三反，闻一而知中，乃学者用功之深，穷理之熟，然后能融会贯通。”体现了程朱理

学追求学问内在化和体系化的学术范式，如《宋史·道学传》所说：“程颢及弟颐寔生，及长，受业周氏（敦颐），已乃扩大其所闻，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亦即通过对儒学经典的融会贯通，达致儒学的整体化和系统化。实际上，程朱理学是将儒道释会通在儒学主体中，形成了新儒学的思想体系。注重融会贯通是中国思想文化包容化生气度和理路的重要特征，而且经受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融会贯通的理念促进了中华多民族文化的和合凝聚，通过思想文化的融会贯通与经世致用的结合，使得中华文化得以传承发展而经久不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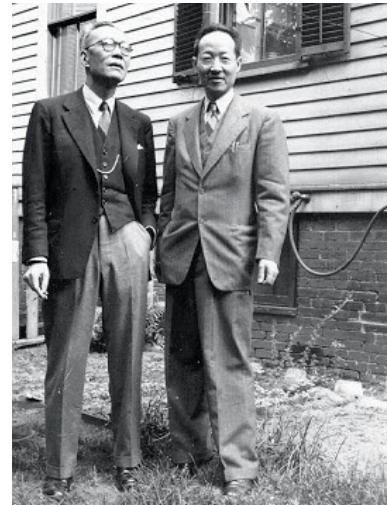
自古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的会通就注重中外文明的交融。西汉张骞西域之行开启了古代丝绸之路中外文明交流的先河；



梁启超（1928年）



王国维



1943年在美国哈佛大学，金岳霖（左）与赵元任合影

明代郑和七下西洋，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外文明的交流交融。明末科学家徐光启在中西文化交流激荡中，敏感地认识到“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他继承了中华文化会通的传统，并以超前的眼光、开放的心态、求变的志向和学以致用的理念，为推进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现代科学进步做出了开拓性贡献。

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通常将“会通”等同于“融会贯通”，其定义如《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所述：“把各方面的知识或道理融合贯穿起来而得到系统透彻的理解”，或如《中国成语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诠释“融会贯通”所述：“融会：融合各种说法，领会其实质；贯通：贯穿前后，全面地理解。谓把各方面的知识或道理融合

贯穿起来，从而得到全面透彻的理解。”

有关“会通”的理念在近现代变得越发明晰而引人关注。到了晚清和民国初年，伴随着西方列强经济、军事的入侵，在文化上加速了西学东渐的进程。此时，实践中西古今文化的融合会通成为许多有识之士追求的文化自觉。梁启超先生十分重视留美学生的文化植根，强调：“清华学生除研究西学外，当研究国学；盖国学为立国之本，建功立业，尤非国学不为功。”同时，又指出“舍西学而言中学，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他在谈及中美文化差别时指出“清华学生应当谋这些极端的贯通融洽，应

当融和东西文化”。1926年～1927年他在清华国学院讲《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课程，在总论中强调“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活动之资鉴”，主张通过古今贯通实现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转化。王国维也认为“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异日发明光大我国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陈寅恪指出：“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取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而赵元任留美归国后，在清华教授数学、物理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中国现代方言、中



徐葆耕

国乐谱乐调和西洋音乐欣赏等课程，是中国语言科学的创始人，又是哲学家、作曲家，亦是中国科学社创始人之一，是一位会通古今中西文理的大师。可见此时的会通，虽然仍然具有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哲学特色，在具体考察对象上则已经超越了宋代鸿儒朱熹的命题，即兼有古今贯通、中西融会乃至文理渗透的理路，形成一种适应新时代的会通境界和范式。这在老清华文科院系中得到普遍的传承发展。如中文系“注重新旧文学贯通和中外文学的结合”、历史系要求“中外历史兼重”、哲学系强调“东西方哲学的相互阐释”等等。清华中文系老主任徐葆耕在他于世纪之交面世的《紫色清华》中谈及清华传统和清华精神时，

一再强调“会通”是清华学派的重要主张，也是清华传统中的重要方面。他谈到何兆武先生论清华学人的特色时说，“他们都具有会通古今、会通中西和会通文理的倾向。”“他把西南联大的学风归结为‘三会通’：古今会通、中外会通、文理会通。”显然，他们所强调的不是将不同文化搬过来汇合在一起，而是经过思考、选择、加工而达至融会贯通并有了新意。

清华在上世纪80年代恢复文科时，就突显了会通的特色。1985年在清华成立了我国首个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融合为特色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室；同年复建中文系时，确立了“以文为主，文理结合”的方针，开办了我国首个科技编辑专业，开展了计算语言学研究，后来又与外文系合作，开办中外文化综合班，培养中外文化交流和比较文化研究的人才。而现在的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院则是通过跨国度、跨文化、跨学科的机制创新，为中外多学科高端学者的合作，为中西文学、文化的融合以及学科的交叉搭建了平台。上世纪90年代，我在参与清华文科的恢复发展的领导工作时，反复强调清华文科发展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与继承发展清华文科的传统密切相关的，这个传统就是自觉的家国情怀和会通

理路。徐葆耕在任人文社科学院学术副院长时十分赞同我为学院制定的“中西融会、古今贯通、文理渗透、综合创新”的学术范式和境界追求，这得到以综合创新中国文化著称的现代哲学家张岱年先生的肯定。在徐葆耕生命的最后时刻所著《清华精神生态史》中高度评价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吴宓、朱自清、闻一多、钱钟书、冯友兰、梅贻琦等对会通学术和教育的追求以及杨振宁、李政道等达至会通的高境界。称“‘会通’，是一种王者的气度”。所以，从清华的历史看，从著名学者的哲学观看，所突出的都不仅仅是外在的形而下的物理形态的融汇，而是更加注重内在的形而上的精神文化的融会。

清华大学自1995年正式确立了建设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世界一流大学目标之后，加大了学术文化会通的探索。当时，我参与了清华和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工作，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针对重工具理性轻价值理性，忽视人文教育的倾向，大力推进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引导学生走出“半人时代”。这为当前学校推进在通识教育基础上加强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合奠定了基础，在学科建设方面也加大了学科交叉融会的努力。如



钱学森

在王大中校长支持下，由吴良镛院士和李强教授联手，推进了城市建筑规划社会学的发展；原中央工艺美院加盟清华成立美术学院，在加速艺术与科学技术的融合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清华大学从2016年推进的科研体制改革首要任务是突破学科藩篱，推动跨学科交叉研究，促进不同学科在综合中实现创新。为此，清华成立了跨学科研究领导小组和专项交叉研究基金；出台了鼓励清华教师跨院校兼职、建立交叉学科学位授予制度的措施；为促进学术资源整合，成立了跨学科交叉研究平台，例如未来实验室将开展科学、技术、人文、艺术的多层次、大跨度交叉，以激发“原创性、交叉性、颠覆性”无疆界创新。

会通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自

觉或者说一种哲学自觉。这里特别需要了解的是张岱年的哲学观和文化综合观。1933年张岱年到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不久他便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为基础，吸收西方逻辑分析方法，并结合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特别是人生理想，于1936年发表了论文《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提出了一个创新观点：“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主张“兼综东西两方之长，发扬中国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遗产，同时采纳西方的有价值的精良的贡献，融合为一，而创成一种新的文化，但不要平庸的调和，而要做一种创造的综合。”在此基础上，张岱年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发表了《综合创新，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明确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论”文化观，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一定要继承和发扬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汲取西方有价值的文化，逐步形成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社会主义价值观来综合中西优秀文化而创造出一种新型的文化体系”，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明晰的哲学模式。而所依据的就是他的“兼和”哲学观，即“最高的价值准则曰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简云兼和，古代谓之曰和，亦曰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亦即通过

综合融会各种不同的观点或事物而达致创新。“兼和”哲学观是对中国古代“和而不同”哲学的继承发展，是张岱年先生在哲学原理上的重大创见。

同时，我们还需要了解的是钱学森先生的哲学观和方法论。他经过长期的实践与探索，提出了解决复杂系统问题的“大成智慧工程”。主张跳出几个世纪前开始的那种将复杂系统不断简化的研究方法——还原论方法。他说必须集哲学与科学，科学与人文艺术，集人类知识之大成，才能得智慧。指出：大成智慧的核心就是要打通各行业各学科的界限，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创造性成果往往出现在这些交叉点上，学科跨度越大，创新程度也越大。特别强调：“一个科学家，他首先必须有一个科学的人生观、宇宙观。”“必集大成，才能得智慧！”“大成智慧学”实际是在当今这个知识爆炸、信息如潮的时代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是一种新型的思维方式和人机结合的思维体系。

高瞻远瞩，开阔视野，敞开胸怀，会通创新，是得大智慧的路径。无论是文化综合创新说或是大成智慧说，都是会通理路的哲学基础，都适应了21世纪文化整体性时代的需求，我们需要努力提升这方面的文化自觉或哲学自觉，哲学自觉正是文化自觉的最高境界。